



劉思齊 主編

毛澤東

與海外人士

東方紅叢書

中國書店

一九四九

劉思齊 主編

與海外人士

中國書店

(京)新登字213号

责任编辑：里 功

陈 刚

封面设计：黄晨光

技术编辑：辛丽娜

·东方红丛书·

毛泽东与海外人士

刘思齐 主编

*

中国书店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171千字

印数：1—30000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8-588-6/C·4 定价：6.00元

我心中的话

1937年我年仅4岁时就来到了主席身边。虽然时光已流逝55年，但当时在主席身旁呀呀学语、依依膝下的情景至今仍朦胧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从此以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他老人家对我那颗慈父的爱心。几十年里，尽管历经坎坷，然而我始终对生活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记得10岁时，在新疆我和母亲一起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在党的大力营救下，4年后我的一家与同狱的其他同志们才得以重返延安。是老区的小米、党的关怀及主席的教诲使我长大成人，又与岸英从相识到结婚。“贫穷”的主席把自己唯一拿得出手的一件大衣赠与我们以表达自己的心意；两桌水酒请来朱总司令、周恩来、刘少奇等革命前辈，向我九死一生的母亲和我们一双新人祝贺。岂料朝鲜战起，岸英牺牲。主席痛失爱子，我也成了20岁的未亡人。其后多年与主席相处，无论承欢膝下，或书信往来，老人一直视我为己出，唤我为“娃”、“亲爱的大女儿”，信后总是亲切地落款“爸爸”、“父亲”。

记得1959年的一个夏日，爸爸在他的卧室与我谈人生时，

F253 A401

说道：“七十三、八十四”，当时我还不不知此典出于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不禁一怔。爸爸笑着说：“阎王不叫自己去。死亡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猛然意识到最关心我的爸爸最终会撒手尘寰离我而去，不禁怆然泪下。

在爸爸的关怀下，我读书、留学，以后老人家还亲自操心，督促我又成了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丈夫双双下狱，罪名是：“反对江青的现行反革命。”爸爸得知后气愤地写下：“娃娃们无罪”，我们夫妻才得以重见天日。

老人家当年对我说：“我死之后，你要是想念我，就到我的坟上来看看。”十几年来，我多少次徘徊在天安门广场上，望着巍峨的纪念堂，心潮澎湃，感到我的心还在与爸爸对话。几十年来，我作为一个普通劳动妇女，尝尽了人生的苦辣酸甜。如今，我已鬓发花白，但回首一生，聊可告慰爸爸的是，我觉得自己活得还算真实。因为我记住了当年洒泪而别时，爸爸曾抚肩慰我：“你永远是我的大女儿。”

如今爸爸已经走了整整16年了。在这百年诞辰之际，承蒙北京、江西、江苏、湖南以及我家乡山东的朋友们，特别是曾在老人家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一起著文，与中国书店通力合作出版了这套《东方红》丛书，作为纪念。

刘思齐

1992年8月30日写在
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

序

毛泽东曾对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风趣地说：“我生着一副大中华的脸孔。”的确，他无疑是本世纪最杰出的中国人。他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在对外国际交往方面，有着诸多建树。

把毛泽东与国际名人的交往按时序连贯起来，正是20世纪世界波澜起伏的重要历史记录。时值改革开放的今天，回首建国前后的那段历史时期，应当说毛泽东早在三四十年代就真正做到了放眼世界未来，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他的许多预见。

从他和著名记者斯诺的长谈，及其他西方人士的会见，建国前后与斯大林、米高扬等重要国家要人的往来；60年代与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元帅的交流；70年代与西方大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尼克松之间的握手，粉碎了一些人以中国为筹码打中国牌的如意算盘。这些都表现了毛泽东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外交风格。回顾后来中美外交关系的发展，毛泽东正是在谈笑风声、旁征博引之间最大地维护了国家利益，砸碎了企图扼杀新中国的枷锁，使中国走向了世界，使世界了

解中国。

70年代初，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一经恳谈，冰释敌对。一个是当年在中国参战的战败国的士兵，一个是奋起抗战的军政领袖，一举完成了恢复邦交的友好关系，被传为中日友好史上的佳话。毛泽东和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两位美籍著名华人科学家，一起谈科学、讲对称，希望共同对人类的进步做出较大的贡献。

特别是毛泽东对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对世界前景的预测，都说明了他有着高远的政治洞察力和哲学家的预见性。

清朝末年，国人曾哀叹：“弱国无外交”。毛泽东自新中国成立之日，面对国外势力对中国的经济破坏、封锁和政治外交上的孤立，以“敢战方能言和、言和更需备战”的气概，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了中国人的民气。他主持的重大外交活动，真正地实现了建国宣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当此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之际，中国已迅速走向世界，走向继往开来的21世纪。回顾毛泽东的杰出外交实践，无疑更能振奋每一个胸怀四海、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编 者

壬申 仲冬

目 录

决定留在苏区参加红军	(1)
他在延安跳起了交际舞	(9)
在凤凰山麓会见白求恩	(13)
和卡尔逊在延安的会见	(16)
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21)
革命兄弟间的深厚友谊	(28)
不愧是目光远大的领袖	(33)
延安是一个思想的工厂	(47)
中国就是爱泼斯坦的家	(56)
在重庆会见美国飞行员	(65)
米高杨秘密访问西柏坡	(67)
和斯大林的历史性会晤	(72)
你是哲学家，又是老朋友	(79)
出兵朝鲜前夕的毛泽东	(89)
我宁愿读毛泽东的著作	(107)
区别只在于长不长胡子	(110)
和伏罗希洛夫深夜交谈	(113)

涉及主权问题毫不让步	(117)
未见过面的同志和朋友	(124)
蒙哥马利眼中的毛泽东	(128)
从延安见面到三次长谈	(137)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	(167)
秘鲁记者心目中的伟人	(170)
毛泽东会见胡志明之后	(172)
在上海会见凯山·丰威汉	(187)
关于世界三划分的谈话	(193)
毛泽东和美国作家斯诺	(205)
毛泽东和他的“乒乓外交”	(226)
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了	(235)
大平正芳对巨人的印象	(241)
毛泽东的影响永世长存	(243)
请田中角荣喝点茅台酒	(245)
基辛格第五次访问北京	(247)
他是个不停顿的革命者	(257)
他说毛泽东有三大功绩	(260)
“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	(263)
“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	(265)
毛泽东与李政道谈“对称”	(272)

决定留在苏区参加红军

两个美国人马海德和斯诺在保安受到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街道两边都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他们高呼：“欢迎美国朋友访问苏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几家店铺前还张贴着中英文写的欢迎标语。在街道的尽头迎接马海德和斯诺的是中央政治局在保安的大部分委员和军政领导干部。长征中的“五老”——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也来了。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正式会见了马海德和斯诺。此时，毛泽东正值中年，是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两个美国人惊异地发现，这位被蒋介石悬赏25万银洋，不论死活都要缉拿到手的红军首脑，颇有些像美国历史上的林肯总统。毛泽东谈了中共对国内外局势的看法。他坦率幽默的谈吐，坚毅豪迈的性格，高瞻远瞩的分析，使马海德强烈感到，这个身材高大的中国革命领袖身上，有着一一种掌握命运的

力量。

毛泽东对年轻英俊的马海德很感兴趣。“你搞过哲学吗？”毛泽东始终关心哲学。马海德腼腆地说：“我不过是一个业余的哲学爱好者。”

马海德他们在保安参观了几天，于7月下旬前往甘肃宁夏边区，采访西征前线的红军。在西线，他们访问了红色工厂和小学，同红军战士有广泛的接触。在宁夏豫旺堡红一方面军总部，他们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马海德他们见到长征的战士“疾病缠身，精疲力尽，衣衫褴褛，但是最后解放全中国的信心却从未动摇。”他们还目睹了红军会师的场面。“要是把全部红军聚合起来，有足球场那么大一地方就够了，”“不过，他们很自信，很乐观，叫我不能完全相信他们。”

马海德能说一些阿拉伯语，他与当地的阿訇交谈。后来上海的报纸竟说红军有位土耳其的随军医生，并说这是“共产国际”势力插手中国的又一证据。

9月22日，马海德与斯诺回到保安。从9月23日开始，毛泽东在窑洞与两个美国人畅谈了十几个昼夜，黄华（斯诺在燕京大学的学生朋友，刚到达陕北）、吴亮平担任翻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的过程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耐心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应客人要求，毛泽东首次披露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这些都记录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

在保安的日子里，马海德和斯诺经常应邀到窑洞去吃辣椒、馒头，品尝贺子珍用酸枣做的蜜饯。贺在长征中受过重伤，当时身体很虚弱。有一次，斯诺提出要给毛主席拍照，

毛欣然应允。在窑洞外选取了角度，斯诺发现毛泽东的头发很长，又没戴帽子。斯诺坚持要毛泽东戴上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一时找不到，于是斯诺就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崭新的军帽取下来让毛泽东戴上。就这样，一张毛泽东头戴五角星八角帽的照片诞生了。这个历史性的镜头，于当年11月14日首次刊登于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从而流传于海内外。那顶红军帽在斯诺逝世后由斯诺夫人赠送给中国政府，现陈列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10月12日，斯诺要离开保安。马海德却决定与红军一起战斗。他对斯诺说：“我决定留在苏区参加红军了，希望你报道和书写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到我，免得国民党特务机关找麻烦，在白区迫害曾经和我交往过的朋友。”诚实的斯诺牢记朋友的忠告，他的《西行漫记》和许多通讯，照片都只字未提始终在一起访问和考察的乔治·马海德。

26岁的马海德加入了红军，开始为贫苦的中国 人 而 战斗。毛泽东亲自任命他为军委卫生部顾问。从此，马海德在毛泽东领导下的陕北开始了新生活。他的原名渐渐被人们忘了，农民和红军战士亲切地称这位大鼻子黄头发的老外马大夫。他身着军装，裹着绑腿，带着听诊器和手术刀，在荒凉的黄土高坡上奔波。有一次，一位红军战士被毒虫咬伤，马海德用嘴对着伤口把毒液吸出，而后敷药包扎，这位战士很快恢复了健康。

这期间，马海德经常见到毛泽东，他们已是忘年交了。马海德已能说一些汉语，甚至能唱几句信天游，他们之间能直接交流了。

1937年2月，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马海德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吴亮平和张浩。马海德后来说：“当时吴亮平同志经常同我谈话，了解我的思想变化和对国外革命运动的看法，后来党小组和支部正式通知我为中共党员。入党时没有什么宣誓仪式。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工人家庭，后来又在上海有那一段经历。我要求到江西去的时候，是打算去革命一辈子的，从未想离开，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我逐步树立了崭新的世界观。”

抗战开始后，马海德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事医疗工作，并负责在延安筹建医院，即后来的延安国际和平医院。这期间他接待了许多来延安的外国朋友。其中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事观察员，埃文斯·福戴斯·卡尔逊，上海时的老朋友史沫莱特，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德国的汉斯·米勒大夫。1938年马海德曾作为八路军的代表，陪同白求恩到五台山去，同他一起在前线抢救伤员。两人在共同的事业中建立了友谊。1939年白求恩因血液中毒病逝，马海德十分伤心。

马海德在延安的火热生活中十分快活。没有因物质的匮乏而沮丧。1939年他认识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江苏籍女士周苏菲。他坠入了情网。由于他的恒心和毅力，还有美国人的出色的口才，马海德成功了。1940年他们在延安举行了婚礼。

1943年后，根据毛泽东和中央的安排，马海德主要从事外事工作。1944年5月，第一批国外联合记者组来延安采访。他们中有哈里森·福尔曼（代表合众社《泰晤士报》）、冈瑟·斯坦（代表美联社、伦敦《新闻纪事

报》)、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代表《纽约日报》、悉尼的《论坛晨报》)等。9月份,由布鲁克斯·阿靠金森、西奥多·怀靠(白修德)、哈罗德·艾萨克斯组成的第二批外国记者代表团又到延安。马海德以自己特有的身份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新闻材料。

1944年7月份,以包瑞德和谢伟思为首的美国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又称“迪克西”使团)。马海德是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参与接待工作的。“迪克西”使团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派出的,旨在了解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寻求美国与八路军合作的可能性。马海德的工作很出色,他与使团的同胞交往甚密,还给他们看病。还曾和谢伟思同住一个窑洞。“迪克西”使团的成员都是些正直的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解放区不抱任何偏见,只是忠实于报告自己的所见所闻。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50年代,他们在国内都背上了“亲共”的罪名,长期受歧视和迫害,直到70年代中美建交前夕才有所改变。

1971年7月26日,谢伟思作为中国人民的客人,解放后首次访问北京,与马海德博士愉快地重逢了。

1946年,马海德以解放区救济总署医药顾问的身份在北京参与了马歇尔的调停工作。直到1947年3月返回延安。他见到了当时在延安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泽东在与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1949年10月1日,39岁的马海德身穿军装参加了开国大典。他和许多红军时代的老战士一起,站在金水桥的前排,聆听了毛泽东的庄严宣告。

新中国成立不久，经周恩来的批准，马海德获得了中国国籍，成为建国后第一位外国血统的中国人。

作为中央卫生部顾问，马海德致力于性病防治工作。当时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性病患者有近3000万。一个日本专家断言，内蒙古性病泛滥，再过30年这个民族就会自然绝种，形势不容乐观。在马海德的领导下，中国性病防治所成立了，马海德和专家拟定了消灭全国性病的方案。

1952年，毛泽东会见了马海德，马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工作近况。毛泽东听了很满意，叮嘱说：性病是旧中国的腐朽产物，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公害。新中国一定要消除这种丑恶现象。你的担子很重啊。

马海德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他亲自率领医疗队深入内蒙古牧区，从严格普查性病患者入手，开展性病防治工作。接着他又转战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新疆等地。1960年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基本上消灭了性病。

就在这一年6月，马海德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首次回到新中国，马海德和路易·艾黎、黄华一道去机场迎接。

10月22日晚，毛泽东在自己的中南海住处宴请斯诺。毛泽东让马海德和艾黎作陪。这是1952年以后，马海德首次见到毛。虽然谈话主要是斯诺和毛泽东之间进行的，但毛泽东对马海德消灭性病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毛泽东说：马海德立了一大功，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麻风病是马海德攻克的下一个目标。正当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遭到“莫须有”的怀疑和审查。早在1943年的“抢救运动”中，由于康生暗中捣鬼，马海德就受到了某人的怀疑。那次他没

什么“坦白交待”的，每天照旧给人治病。而这次从1966—1970年，他彻底“靠边站”，给群众治病的权利也剥夺了，行动自由受到限制。1970年，斯诺又一次来到中国。国庆节那天，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可马海德却未能与斯诺见面。

马海德与毛泽东有记录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5年11月24日是旅居中国的美国新闻记者，毛泽东的朋友也是马海德的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80诞辰日。毛泽东执意要给斯特朗祝寿，当时毛泽东正在上海。

11月23日，斯特朗乘一架专机飞往上海，同机前往的有包括马海德在内的30多位美国和中国人，他们都是安娜的朋友。

次日中午，毛泽东在上海国际饭店接见了斯特朗和她的朋友。毛看上去身体很好，精神愉快。大家围坐成椭圆形。

毛泽东与客人一一招呼后，点燃了一支烟，然后开玩笑地说道：我，一个吸烟者，是一派；而斯特朗同志，则是反对派，不吸烟的一派。

斯特朗一时无言以对。马海德直接向毛泽东发出了挑战：“你把这一问题看成是派别的问题吗？”

“当然，”毛泽东开始反击，“在我和医生之间，医生说我不应该抽烟，我说应该。”在毛的鼓动下，其他几个人也点上了香烟。

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整个谈话“充满了幽默，巧妙的应答和反驳，以及经常不断的惊奇。”

接近尾声时，毛泽东突然中止自己的话题，转向马海德“你们卫生部的人一点也不管人民的健康，看看现在多晚

了，还没有吃饭？我的妻子已经邀请我们去进餐了。”这时江青进来要客人去洗漱一番，然后就餐。

1970年以后，马海德被分配到北京阜外医院，总算可以工作了，可是病人听说这个高鼻子大夫是“国际特务”，吓得谁也不敢请他看病。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夕，马海德才被调到首都医院，从事点门诊工作。

这期间，毛泽东也没忘掉马海德。1972年初，埃德加·斯诺的病情加重。斯诺夫人洛伊斯写信给马海德有关斯诺手术的情况。马海德回信要斯诺来北京治疗。毛泽东也得知此事，很快中国政府决定派医疗小组去瑞士接斯诺，并指名让马负责。1月底，马海德率医疗小组到达瑞士的埃辛斯村，医疗小组发现斯诺的病情太重已不可能去北京。在与有关方面商妥后，决定留在埃辛斯村斯诺家中治疗和护理。

2月初，黄华也来到斯诺家中，他已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这次是去纽约赴任的，他带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问候。黄华和马海德一起走进斯诺卧室，斯诺惊喜地说：“好啊，我们三个‘赤匪’又见面了。”

在最后的日子里，斯诺真切地对马海德说：“乔治，我真羡慕你！我羡慕你走过的道路。我常想，如果当时我也像你一样留在延安，我今天的境况将会怎样呢？”

1976年9月，马海德和亿万中国人民一样沉浸在悲痛之中。毛泽东，这位改变了一个美国人人生道路的伟人永远离开了人间。

马海德又到了自己的岗位上。1981年他提出了中国本世纪消灭麻风病的目标。虽然已是古稀之年，可他为穷人治病的初衷一如既往。